

从人口学视角论中国经济减速问题^{*}

蔡 昉

摘要：中国经济减速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与国际出口需求减少共同作用的结果。对马尔萨斯经济增长阶段、刘易斯转折点、新古典经济的索罗时代经济增长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外经济学家思考中国经济的视角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短缺基础上的，未结合中国人口结构的实际情况，导致对亚洲国家经济研判的错误。指出从2010年始，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扶养比提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能靠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而拉动，应该接受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现实，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建议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词：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红利；扶养比；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

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

^{*}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

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才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眼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

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抚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抚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

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抚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

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使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

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

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

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力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八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 [1] (美) 保罗·克鲁格曼.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 [M].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3.
- [2] 蔡昉, 林毅夫. 中国经济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 [3] (美) 罗伯特·M·索罗. 增长理论:一种解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 [4] (英) 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等. 人口论 [M]. 郭大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5] 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1).
- [6] 蔡昉. 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与中国现实的差距——兼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建 [J]. 2010, (2).
- [7]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J]. 经济研究, 2010, (4).
- [8] 蔡昉.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J]. 经济学动态, 2011, (6).

(编辑:韦京)